

聂荣臻回忆录

战士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责任编辑：陈汉民
装帧设计：姜学亮

聂荣臻回忆录
(上)

战士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印张 10.75·190 千字
1983 年 12 月第二版 1983 年 12 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85·31 定价：1.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1)
第二章	留法勤工俭学	(12)
	远涉重洋.....	(12)
	留法勤工俭学	(17)
	世界观的转变	(24)
	在莫斯科的日子里	(34)
第三章	回国参加大革命	(41)
	到黄埔军校	(41)
	北伐战争和在武汉军委.....	(49)
第四章	南昌起义	(59)
	从武汉到九江	(59)
	在马回岭.....	(63)
	在南昌	(65)
	南 下	(69)
	失利之后.....	(73)
第五章	广州起义	(79)
	起义之前.....	(79)

	起义经过	(84)
	失败之后	(90)
第六章	白区斗争	(98)
	在香港广东省军委	(98)
	顺直省委	(111)
	在上海	(118)
第七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132)
	去中央革命根据地	(132)
	到红一军团工作, 参加打漳州	(138)
	水口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	(153)
	到建宁、黎川、泰宁开辟新区, 鏖战 浒湾	(160)
	反第四次“围剿”	(166)
	第五次反“围剿”之前	(178)
	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187)
	政治思想工作	(203)
第八章	长 征	(213)
	突破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	(213)
	奔袭道县, 强渡湘江, 突破敌人第 四道封锁线	(221)
	黎平会议和渡乌江	(234)
	打开遵义, 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	(241)
	四渡赤水和遵义会议后的余波	(250)

	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	(261)
	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会师	(273)
	过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	(277)
	出腊子口，在吴旗镇打骑兵结束长征 ...	(287)
	打直罗镇 献奠基礼	(295)
第九章	在陕北	(303)
	东 征	(303)
	西征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314)
	山城堡战斗.....	(326)

目 录

第 十 章	开赴抗日前线·····	(337)
	洛川会议前后·····	(337)
	冒雨出征·····	(343)
	首战平型关·····	(348)
	五台分兵·····	(359)
第十一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初创·····	(366)
	受命之后·····	(366)
	从五台到阜平·····	(372)
	边区党政机构的建立·····	(380)
	开辟冀中平原根据地·····	(391)
	冀东的开辟与反复·····	(397)
第十二章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	(408)
	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了·····	(408)
	改造杂色武装·····	(420)
	游击战与歼灭战·····	(432)
	反磨擦斗争·····	(448)
第十三章	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	(459)

	政策是重要保证	(459)
	《双十纲领》	(466)
	反敌经济封锁的斗争	(471)
	边区的文化	(479)
	有朋自远方来	(483)
第十四章	百团大战	(493)
	正太路破袭战	(493)
	扩大战果	(499)
	胜利中的问题	(504)
	大战中的插曲	(509)
第十五章	在反“扫荡”的战火中	(516)
	“铁壁合围”的破产	(516)
	冀中“五一”反“扫荡”	(530)
	艰苦的一九四二年	(536)
	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542)
第十六章	在延安的日月	(554)
	从敌后回延安	(554)
	延安整风	(560)
	抗日战争的胜利	(566)
	关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基本 经验	(570)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吴滩镇。

江津是一个丘陵起伏的地方，紧靠着长江，离重庆也近，自然风光很秀丽。吴滩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川东小镇。

在江津，聂姓是个大家族，到我这一辈，按家谱排是“荣”字辈，所以给我取名荣臻。我出生的时候，家庭已经破落了。从我记事时候起，打下深深烙印的，不是家乡的山水风光，孩提时代的欢乐，而是日月的艰辛，农村的动荡和农民生活的苦难。

我的父亲聂仕先，因度日艰难，每天除了干活的辛劳，就是为家庭生计发愁，留给我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母亲唐氏，是个典型的旧式妇女。她把自己的精力和感情，全部用于操持家务，抚养我和妹妹上。年幼的妹妹，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从小呆在家里。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一些，但一家人感情融洽，相处得很好。

我到上学年龄的时候，正处于辛亥革命酝酿时期。国家政治上的激烈动荡，各种社会思潮的日益活跃，各派政治力量的争斗，新学与旧学的交替和斗争，所有这些，都以辛亥革命为标志，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封建社会正在瓦解，民主主义正在兴起。中国社会的这一变动，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堂政治课。

由于家庭困难，民主主义正到外祖父家读私塾。外祖父家距我们家不远，是为第一堂富有的一个地主家庭。教私塾的，是一位前清秀才，父母里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教的都是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一类的东西，沉闷得很。但在外祖父家，也有难得的乐趣。那时，我三舅在重庆法政学校读书，法政学校当时是重庆的最高学府。他经常回家，一回来，就带来许多社会消息。舅父的亲戚朋友，有的是共和党，思想倾向保守，有的是国民党，当时比较激进。他们碰在一起，常常争论各种问题。我虽然年纪很小，不懂政治，但觉得他们的争论很有趣，对城里来的消息也感到新奇。尽管搞不清共和党是怎么一回事儿，国民党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也无所谓，但已模模糊糊地觉得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就这样，政治需要变革的想法，不知不觉地闯进我年幼的心灵之中。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不时向四川卷来。清王朝政府对四川的统治摇摇欲坠，整个四川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

由于四川的富饶，清政府不甘心放过这块肥肉，加上四川又是西南政治经济中心，它要统治西南，必须控制四川。但是，清政府又深感鞭长莫及，因为四川交通不便，它与外界的主要通道是靠长江，运兵进川和运物资出川，全凭着长江。除长江之外，就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了。同时，四川人民富有反抗精神，对清王朝的统治并不买帐，不断掀起各种斗争。因此，清政府对四川人民是又气又恨，统治手段特别残酷。

我记得，很小的时候，就听大人们说，清朝的官员扬言，“你们四川人想中状元，除非是石头开花马生角”，可见对四川人厌恨之深。可是，四川人还是争了一口气，有个叫骆成骧的四川人，考中了清朝最后一科状元。这个人辛亥革命前就在成都办高等学堂，热心教育事业。四川人都觉得骆成骧给四川出了气，争了光，把他中状元的事情传为佳话，说什么“骆”字拆开是“马”字和“各”字，“角”和“各”在我们四川是谐音，也就说成是马真的生了角了。

以后，我听到的就是“保路”运动，这个运动在四川闹得最为轰轰烈烈。清王朝为了侵吞四川民间为办铁路而筹集的巨款，竟然宣布四川的铁路由民办收归国有。这样一来，四川人民对清王朝的愤恨，就象火山一样迸发了，各地纷纷成立了“保路同志会”。那阵子，一天几个消息，一会儿听说捉了赵尔丰，一会儿又听说捉了端方，以后又听到把这两个家伙先后处决的消息。当我们听到四川人民的

保路运动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心里真是痛快极了！

在这伟大变革的日子里，我们大家再也无心读那些“之乎者也”了，整天在一起议论这些激动人心的大事，老师也不怎么管。在当地，我们最关心的是“同志军”围攻合江。合江知县黄炳燮，凭借合江城三面濒江，城墙坚固，只有西门是陆路出入口，而这里又是高岗，在当时条件下，确实易守难攻，他坚守合江，拒不投降。同志军汇集各路民军几万人，围攻合江几十天，从九月下旬一直打到十二月初，黄炳燮才觉得大势已去，出城投降。但到后来，合江又落到云南军阀手里。

辛亥革命胜利后，老式的私塾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逐渐被新式学校所代替。我也进入新式学校读书，知识面逐渐开阔起来。虽然还学文言文，但白话文越来越多，此外还增加了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使我懂得了许多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

小学毕业后，我考入江津县立中学（即现在的江津第一中学）读书。这所中学设在江津县城，是本世纪初创办的。那时的学制为四年，规模比较大，有好几百人，学生都是住宿生。我进校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班（即第八届）的学生了。

中学时代，我已十八九岁。在这里，我一面读书，吸收文化科学知识，一面从当时国内国外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中，不断地思考，寻求真理，摸索自己要走的人生

道路。

辛亥革命带着先天的软弱性。革命胜利不久，袁世凯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复辟称帝，接着就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和反对军阀混战，对我的思想触动最大。

江津中学订有各种各样的报纸刊物，包括《新青年》这样的进步刊物。另外，四川虽然交通闭塞，但电报还是通的，各种消息通过电讯传到四川，这些消息又在报刊上广泛传播。我们这些青年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弊，抒发爱国热忱。

签订二十一条以后，大量日本货流入中国，也源源不断地流进四川。处在长江边上的江津县城，商业比较发达，所有百货商店摆的几乎都是日本货。这引起了我们强烈的反感。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正值寒假前夕，同学们气愤已极，先是三三两两慷慨激昂地议论，后来就自发地在校园里集合游行，高呼口号，强烈抗议。

寒假中，由我们江津学生联合会出面，通知大家利用假期到各地演讲，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同胞们起来，打倒汉奸卖国贼，共赴国难。我在寒假中回到家乡，与别的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宣传组，曾到各处作过几次演讲。我演讲时特别激动，不管人家听懂听不懂，把我所知道的事情一口气诉说了一通，还获得了一阵阵掌声。这

是我参加政治活动的开始。

寒假结束，回到学校。不久，北京发生“五四”运动。我们也在学校和江津县城街头集会游行。同学们撒传单，贴标语，进行演说，号召以抵制日货来作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实际行动。我们与江津甲种农业学校等学生联合在一起，派代表去动员一些商店老板不要贩卖日货，但是一些大商号根本不理学生的要求，一些小商店也跟着跑。这样一来，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于是，对江津县城几家销售日货的大商店，进行了搜查，将查出的大批日货搬到“文昌宫”封存，同学们轮流看守，准备焚烧。我们还沿江巡逻，凡装有日货的船只不准靠岸。这时，江津县长聂述文出面调停，说是调停，实际上是想压服。谈判的时候，江津驻军团长王天培参加，会场外面站满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聂述文唱白脸，王天培唱红脸，企图迫使学生屈服。青年学生血气方刚，根本不理他们这一套，坚持要焚烧日货，商人们则在聂述文、王天培支持下，要求赔偿经济损失，双方相持不下，几经谈判，都没有解决问题。当我们得知凡尔赛和约正式签字的消息，同学们的愤怒情绪达到顶点，立即集合，要上街游行。津中校长邓黎仙（此人是国民党员）、学监李耀祥、罗中林百般阻挠，先是劝说威胁，后来干脆关上校门不准上街。我们一二百名学生，一气之下，冲出校门，串连其他学校的同学，游行到“文昌宫”，将日货搬到河边，全部烧毁。这样一来，

引起商人的极端仇恨，他们勾结反动军警，在校方配合下，准备对我们下毒手。好在暑假将至，我们就离开了学校。很显然，我们几个学生代表在学校是再也呆不下去了，呆下去肯定要受迫害，这也是促成我去法国勤工俭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时这种焚烧日货的行动，做得有些过火。这些东西，本来是中国人自己拿钱买的，烧掉不是可惜了吗？而对日本人毫无损失。相反，烧了日货，侵犯了商人的利益，反而造成商人对我们的不满甚至仇视。宣传抵制日货无疑是正确的，但爱国运动的目标应该自始至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把商人作为说服争取的对象，动员他们一起参加抵制日货的行动。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少年气盛，一怒之下，就不考虑后果如何了。

在中学时期，另一件对我影响很深的事情，是连年的军阀混战，它把国家搞得四分五裂，落后不堪。在四川，也是大小军阀混战不已。有个军阀叫刘存厚，长期盘据川北，一直到我们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到川北建立根据地时，才把他消灭。四川军阀有个特点，因为交通不便，经常是关起门来打，需要的时候，联合客军打对手，客军就是云南、贵州的军阀。而四川军阀自己则从来不打到外省去，这主要是因为四川富有的缘故。

在兵荒马乱之中，各地成立了许多民防团，大多用以自卫。在我们江津，也成立了民防团。记得在“文化大革命”

命”中，有一回研究四川武斗问题，我对毛泽东同志说：过去有人讲过，“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要解决四川问题，可不简单，不能掉以轻心。毛泽东同志听后笑了起来。

军阀们打来打去，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弄得哀鸿遍地，民不聊生。所有这些发生在我中学时期的兵连祸结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恼，痛恨军阀，尤其是对外来军阀更加痛恨，总希望把他们赶出四川去。但是，那时我很年轻，看不清军阀混战的本质，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总感到对这些现象实在无能为力。出路何在？我当时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国去学点本事，回来办好工业，使国家富强了，也许能改变这种局面。军阀混战造成国家贫困落后，更增强了我对“工业救国论”的信念。这是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中学时期，也知道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多少有这种印象：这个革命是进步的，成立了劳农政府，感到新鲜，但弄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看到《新青年》上一些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又众说纷纭，各有各的主张，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即改良主义）也夹杂其间。尤其是无政府主义，当时在青年中的影响比较大，但我认为他们的办法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且许多道理我还弄不太懂，所以当时的社会主义宣传没有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要说有些影响，那就是我深信中国社会要变，只有

变才有出路。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到的结果是到处碰壁，不能解决问题。进步思想界提倡反对封建，反对禁锢妇女，反对八股文，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向西洋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等，这些我都是赞成拥护的。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怀着变革现状的热情，一九一九年暑假期间，我决心去法国勤工俭学了。当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中国各地逐步兴起。去法国人数最多的，一个是四川，一个是湖南。在四川，又数江津去的人最多，据最近不完全统计，江津一县就去了三十多人。我约了几个同学，先到了重庆，打听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办法。事先我们知道四川有两个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一个在成都，一个在重庆。我们到重庆是想打听一下，究竟是经过预备学校好，还是直接去法国好，再就是了解一下去法国的手续、费用等具体问题。在重庆得知留法手续很简单，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法国正缺劳力，只要通过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签个证就行了。在预备学校又主要是学法文，大家商量说，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到法国学法文，比在国内学效果好，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哪知回到家里，父母不同意。我在家里是独生子，父母舍不得我远离家乡，担心我飘洋过海，会不会出什么意外。我反复向他们说明留在家里没有出路，因为烧日货，可能还有被捕的危险。父母听了，也觉得有道理，爱子心切，希望儿子能有点出息，最后还是同意了我去法国。自己去法国，要一大笔钱，

家里穷，就靠我几个亲戚帮助，筹措了三百块银元。这样，我和十来位同学怀着富国强兵的理想，先到重庆，通过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到法国领事那里办了护照。

从此，我一别故乡，就是三十六年。一九五五年我到西南调查军事工业的情况，才重新回到时常思念的故乡。回到家乡，真是思绪万千。我的父母和许多亲朋故交已经去世，我默默地思念他们，但最使我思念的，是那几位为革命而牺牲了的同乡同学。那次回家，我到了江津中学，一到学校，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吴平地等烈士的形象，立时浮现到我的眼前。他们在学校时就追求进步，关心时政，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国事，切磋琢磨。吴平地同志牺牲得最早，他是我的同班同学，中文基础很好，一九二〇年北上考进北平师范大学后，经常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加入了共产党，给李大钊同志当助手。不幸，一九二七年四月，同李大钊同志一起被捕牺牲。钟汝梅、戴坤忠、傅汝霖同志也于一九二〇年前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其中钟汝梅是与我一路走的，一九二一年还一起在法国克鲁邹钢铁厂做工。他在法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我们在莫斯科学习回国，他也到苏联学习，一九二六年回国，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江苏省军委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戴坤忠、傅汝霖同志回国后，被派往洪湖地区贺龙同志的部队中。一九三二年我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听到这两位同志在对敌斗争中先后英勇牺牲的消息。我站在校园